



结构完密 方法新颖

——评《唐宋词在明末清初的传播与接受》

韩立平 彭国忠

文学的传播与接受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愈来愈受到学术界的青睐。就词学领域而言,出版的学术成果业已不少。陈水云等著《唐宋词在明末清初的传播与接受》就是其中一部优秀的著作。作者之所以选择传播与接受作为词的研究视角,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试图打破文献、创作、理论相隔离的做法,想通过传播与接受的视角将三者的研究相打通,二是试图改变词史上先后代序的研究思路,将唐宋词与明清词放在同一个研究平台上进行综合考察,做到古今贯通,还原文学史原貌。这样一方面可以看到唐宋词在明末清初的传播情形,另一方面也了解到明末清初词坛的文学创作是怎样接受唐宋“词统”的,明末清初所确立的“词统”对后代的创作和理论又产生了哪些影响。通过以上问题的讨论,作者希望能对明末清初的文学现象有三个方面的认识:一、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都是前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共构而成”;二、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不仅能将古今文学打通,而且也能将古今文学的接受方式打通;三、文学的生成离不开特定时代,各种因素的合力作用成就了特定的文学风貌。

在以上总体思路的贯彻下,本书的写作主要体现出了两个方面的亮点。

第一,结构完密。作者的初衷之一是改变文献、创作、理论相隔离的研究格局,将三者打通,本书结构框架的设计即体现出了作者这方面的努力。本书除绪言与附录外,分成了上、中、下三篇。上篇第四章是从文献层面探讨唐宋词在明末清初的传播与接受:唐宋词籍的探访和收藏,唐宋词籍在明末清初的刊布,唐宋词选在明末清初的重编,唐宋词籍“副文本”及其传播指向。中篇第四章是从理论层面探讨传播与接受:关于唐宋词接受的理论论争,清初词坛的“尊柳”与“抑柳”,明末清初《漱玉词》接受史略,“稼轩风”在明末清初的回归。下篇第四章则是从创作层面探讨传播与接受:云间派接受唐宋词之进路,阳羨派接受唐宋词述论,浙西派接受唐宋词述论,纳兰性德文学接受述论。这样全书三篇十二章,已基本涉及到唐宋词在明末清初传播与接受的各个方面,结构非常地完密。

第二,方法新颖。如在上篇第四章唐宋词籍“副文本”及其传播指向中,作者引入了“副文本”的概念。“副文本”一词是由法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杰特德·热奈特提出来的。他在1979年出版的《广义文本之导论》中首次提出“副性文本”一词,1982年在《隐迹稿本》一书中明确提出“副文本”。热奈特指出,“副文本”是相对于正文而言的,包括有标题、副标题、互联型标题;前言、跋、告读者、前边的话等;插图;请予刊登类插页、磁带、护封以及其他许多附属的言语或非言语标志。唐宋词集的副文本,以卓人月、徐士俊合辑的《古今词统》为例,其副文本就包括:标题、序(包括徐士俊、孟称舜二序)、目次(依词调字数多少为序)、旧序(包括何良俊、黄河清、陈仁锡、杨慎、王世贞、钱允吉、沈际飞等人明刻《草堂诗余》)、氏籍、杂说(包括《作词五要》、张玉田的《乐府指迷》、王世贞的《论诗余》、张纘《论诗余》、徐师曾的《论诗余》、沈际飞的《诗余发凡》)以及附录部分的《徐卓晤歌》,还有在正文中出现的徐士俊及前代汇评等。又如清初浙派词人编选的大型词选《词综》,其副文本部分包括:标题、序(包括汪森序、柯崇朴后序、汪森补遗序)、发凡(朱彝尊撰)、目次(依词人年代先后排序),此外还有正文中对作者的生平和创作的简要评介等。对于明末清初唐宋词集的“副文本”,作者首先通过列表的方式,详述了自万历十年(1582)刊



刻《尊前集》至康熙五十五年(1715)刊刻《古今词选》等一共35部唐宋词籍的具体情况,然后依次从标题、序跋、凡例、目次、词人姓氏和编者名录、词话或评语、外文本共七大方面探讨了副文本的传播指向。比如,作者指出明人刊刻的词集多以“诗馀”命名,而自万历末年起,以“词”直称词集的情况逐渐多了起来,如《词的》、《唐词纪》、《唐宋元明酒词》、《词菁》、《古今词统》、《古今词汇》、《词综》、《词洁》等。词集的命名或曰标题:“词的”、“词统”、“词菁”、“词综”、“词洁”都带有很明确的指向性,体现了较强烈的编选目的。又如目次层面,在明代最为流行的《草堂诗馀》是以题材内容为主要分类标准的,目前所知有16种之多。然而,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上海顾从敬刻《类编草堂诗馀》,将原来以内容题材分类改为按词调字数多少为序编目,这一编目次序的改变对明末以后词集的编排产生极深远的影响。在清初编选的各类选本,无论是通代词选还是断代词选,不再有以题材内容编目的分类本。作者最后总结出唐宋词集的副文本具有批评功能,副文本对正文本有意义建构的作用。

正如作者在绪言中所强调的,文学的生成离不开特定的时代因素。本书在探讨唐宋词传播与接受的具体问题时,除以上两个亮点之外,尤其注重从时代背景上追寻根源。如上篇第二章唐宋词籍在明末清初的刊布,在由文献层面梳理了《花间集》、《草堂诗馀》、《绝妙好词》、《乐府补题》的传播、影响、发现的过程之后,更结合具体的时代背景探寻了明末清初词学观念的变迁。作者指出,在明末崇祯年间,社会情势发生急剧逆转,朱明王朝在风雨飘摇之中走向灭亡,满洲八旗的铁蹄很快地踏上了繁荣富庶的江南土地,过去从未经历过社会大变动的江南文人终于体会到了什么是“天崩地裂”。那些原来以写艳词而自娱的江南文人,开始把自己的人生感受并入艳词,清初的艳词因之被注入了一种深刻的美学内涵。《花间》、《草堂》在明末、清初的不同传播环境使其传递意蕴大不相同。《花间》、《草堂》在明末的传播带有宴嬉逸乐的成分,进入清初以后,它们的传播则是“暗度陈仓”,读者借《花间》、《草堂》的接受表达其政治寓意。在清朝进入政治清明的康熙盛世以后,随着统治者加强对思想界得控制,持有反清思想的江南文人逐渐承认了清朝统治的合法性,因此必须选择符合自己审美趣味的唐宋词选——《乐府补题》和《绝妙好词》,树立“风雅之旨”的审美标准,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第三章从唐宋词选的重编看明末清初词学观念的建构,作者由尊体与辨体这一话题,探讨了康熙年间受时代因素影响词学观念。清初人以极大的热情全面、透彻地总结了词之本性,从根本上破除了词为诗之馀绪的传统习见,改变了词长期以来作为诗之派生物的地位,为词体取得应有的文学史地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选本可以说是功不可没。康维崧即在《今词苑序》中明确提出“选词所以存词,其即所以存经存史也夫”的观点。康熙四十六年《御选历代诗馀》的出现更是将词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玄烨认为诗词不仅同源,且性理相似,都有关政教、裨益身心,诗道不可偏废,词道亦不可偏废。由于康熙皇帝的亲力亲为、亲选亲定、大力提倡,词最终摆脱了小道的尴尬身份,取得了与诗文同等的地位。

在中篇理论层面的传播与接受研究中,作者选取了李清照《漱玉词》的接受为个案。作者指出,自南宋至明初,人们对李清照的认识虽然看到她的才华,但评论她的作品总是不由自主地受到传统伦理观念的约束。而自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江南市镇的兴盛和繁荣,市民文化的崛起和世家大族的产生,维系社会秩序的程朱理学越来越显露出它与新时代的不适应性,思想文化界发出了要求打破沉闷局面的呼声。阳明心学深刻地影响着公安派、竟陵派,引发他们对女性才华的尊重,对女性文学的格外看重,这种特定的社会风尚使得李清照诗词纷纷进入各类女性选集の入选篇目,一方面为李清照的作品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也未李清照作品的经典化做出了应有的努力。

下篇创作层面的传播与接受研究,有不少地方都体现出作者对于词文本的细读功夫和审美眼光。如第十一章浙西派接受唐宋词述论,作者在探讨朱彝尊接受姜夔时,发现姜夔对于“舟”这个意象特别偏爱,反映出对于飘零,对于浪迹江湖、寄人篱下生活有着深刻而难忘的感受。如“无奈苕溪月,又唤我扁舟东下”(《探春慢》)、“南去北来何事,荡湘云楚水,目极伤心”(《一萼红》)、“闹红一舸,记来时常与鸳鸯为侣”(《念奴娇》)等,与此相似,朱彝尊因为爱情的关系也特别喜爱“舟”这个意象,如“一面船窗相并倚,看绿水,当时已露千金意”(《渔家傲》)、“一湾流水,半竿斜日,同上归艖。赢得渡头人说,秋娘和配冬郎”(《朝中措》)、“尽说比肩人,目送登舳,香渐辣,晚风罗带。催柔橹啞啞拨鱼水,分燕尾溪流赤澜桥外”(《洞仙歌》)等。在这一点上,朱彝尊与姜夔达成了默契,那种跨越时代的沟通让他们惺惺相惜。在第十二章纳兰性德文学接受述论中,作者指出纳兰性德词风的四个方面:精巧高丽,刻画花间;哀感顽艳,瓣香重光;清新超逸,直越小山;选择之外的通达。可以说对纳兰性德词艺术的审美辨析非常精准,同时又通过列表的方式比较了纳兰词与后主词、小山词等宋代名家词之间在意象语汇层面的联系,眉目清晰,予人多方启迪。

要而言之,陈水云等著《唐宋词在明末清初的传播与接受》篇章结构的完密和论述方法的新颖是两大亮点,结合时代背景分析文学现象是其贯穿始终的研究视角,它是近年来词学领域传播与接受研究的力作,

● 作者简介:韩立平,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文学博士;上海 200241。Email:hanliping0622@163.com

彭国忠,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guji121@aliyun.com

● 责任编辑:何坤翁